

清平山堂话本校注

前言

宋元話本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宋人之「說話」及其影響》說：「這類作品，不但體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話，所以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一〕浦江清師曾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沒有宋元話本就沒有後來明代的擬話本小說、長篇的章回小說；沒有這些無名氏文人，就不可能產生施耐庵、羅貫中這樣偉大的小說家。宋元話本的重要地位即在於此。」〔二〕又說：「話本的發展爲近代口語的文學奠定了基礎，開闢了文學語言的新路。」〔三〕這就充分說明了宋元話本的歷史地位和文獻價值。我們能不能再引申一下，如果沒有《六家小說》和《三國志演義》《水滸傳》這樣的作品，就不會產生「三言」和《儒林外史》《紅樓夢》這樣的名著，甚至「五四」以後的白話小說，也不會如此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因而發展得較爲順利。

《清平山堂話本》是現存宋元小說家話本中最接近原貌的版本，也有不少藝術水準較高的作品。它比講史家的話本題材更寬廣，語言更通俗活潑，收了不少宋元話本的代

表作，爲近代口語化的文學開闢了道路。它在中國小說史上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可惜的是原書已經散失了大半，剩下的只有二十九篇殘缺不全的作品。

《清平山堂話本》原名《六家小說》，是明代嘉靖年間洪楸清平山堂編印的。據晚明祁承 《澹生堂藏書目》卷七小說家記異門著錄，分別題名爲《雨窗集》《長燈集》《隨航集》《欽枕集》《解閑集》《醒夢集》，每集十卷，共六十卷。清人顧修《彙刻書目初編》著錄與之相同。從六集各具書名看來，稱爲「六家小說」是比較合理的。但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嘉惠堂本）卷二湖心亭條引作《六十家小說》，《趙定宇書目》著錄亦作《六十家小說》（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影印本一九三頁）。這只是對六個集子的總稱，其實是應該分別稱各個集子的正名。晁瑛《寶文堂書目》子雜類只著錄了《隨航集》一種，下注十種。其餘都是散錄單篇，像是早已單本流傳，或者可能還是洪楸彙刻之前的舊本，如現存殘頁的元刻本《紅白蜘蛛》，在《寶文堂書目》裏就有《紅白蜘蛛記》的記錄。日本學者中里見敬教授根據版面有補刻的跡象，得出結論說：在清平山堂刻本之前，已有小說舊本的存在^{〔四〕}。這是可信的。現存《雨窗集》中《錯認屍》入話「世事紛紛難竟陳」，「竟」字刻在行外，原爲墨丁，大概是重印時不便挖改，才在行外補刻的。《警世通言》改名爲《喬彥傑一妾破家》時却改作了「訴」字，可能馮夢龍的底本

還是有墨丁的初印本，「竟」字還沒有補出。又如《洛陽三怪記》中挖改的字很多，像是在利用舊版重印時改的。更令人驚詫的問題是《欽枕集》的《羊角哀死戰荊軻》殘存的第四頁，第一行末兩字「不而」，第二行末兩字「頭半」，第三行末兩字「飢賢」，無法讀通。原來第一行末缺了一個字，據《明言》應是「肖」字，讀成「不肖弟」。「而」字應屬第二行，讀成「點頭而答」；第二行「半」字應屬第三行，讀成「半飢半飽」；第三行「賢」字應屬第四行，讀成「楚君招賢」。下面第九、第十行還有錯字，也是如此。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對此頁已作了挖改，但沒有說明，第一、二行還沒有改正。（譚正璧、石昌渝兩先生的校本已有所校正，但不徹底，又沒有說明依據。）幸蒙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允許我校讀原書，才驗證了並非裝裱錯行，還是原本有誤。想來是翻刻所據的底本已有殘損，造成了末一字位移的錯版奇跡。否則它的底本可能是活字版，因散架而造成末字移位了，不過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總之，從版面的墨丁、缺字、錯字看，清平山堂所藏的底本就是殘缺多錯的劣本，或者竟是利用殘損的舊版重印的。

清平山堂刻本《六家小說》久已未見流傳，一九二八年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據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殘本影印時，考證出原為清平山堂刻本，因不知集名，就定名為《清平山堂話本》。後來馬廉先生又從寧波收購到了《雨窗集》和《欽枕集》的殘本，共十二篇，又

據以影印，合稱《雨窗欹枕集》。阿英先生又收藏了《翡翠軒》和《梅杏爭春》兩篇的殘頁，從版面看也是清平山堂刻本，但殘缺過甚，無法整理，只能作為存目附錄了。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把《清平山堂話本》和《雨窗欹枕集》合併影印，仍用《清平山堂話本》為書名。這個版本通行已久，流傳很廣，但影印中描改失誤不少。現在以古今小品書籍刊行會影印本和馬廉先生影印本合為一本，加以校注，書名也不宜再回改為《六家小說》或《六十家小說》了。

洪楸，字子美，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活於明嘉靖、隆慶年間。出身於書香門第，是藏書家而兼出版家。刻印有《新編分類夷堅志》《唐詩紀事》《路史》等書。丁申《武林藏書錄》卷中有簡明的記載：「楸，字子美，蔭詹事府主簿，承先世之遺，縹緇積益，餘事校刊，既精且多。迄今流傳者如《路史》，見於《天祿琳琅》，稱其校印頗佳，深於嗜古。《文選》見於《平津館鑒賞記》，田叔禾序稱其得宋本重刊，校讎精緻，逾於他刻，且文雅有足稱者。」〔五〕洪楸刻書能注意到民間的俗文學，還是難能可貴的。《六家小說》書中錯漏很多，顯然他不屑於費心校勘。但是它恰好保存了許多民間說唱的本來面目，保存了不少宋元時代的生活面貌和語言特徵，成為小說史和漢語史的寶貴史料。

話本出於民間說話人和書會才人之手，有的出於口耳相傳，記錄抄寫中錯亂很多。

傳刻中又有隨意刪改的現象，到了晚明馮夢龍等文人手裏又被逞臆修改，就湮滅了許多原著的痕跡。因此話本的斷代考證，成爲小說史上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多年來，有人從某些跡象考證，否定了某些作品是宋人話本；也有人從某些現象考證，肯定了某些作品的年代。但如果對今本作全面的考察，就會發現有許多複雜錯綜的現象。正如近代漢語學家劉堅學長所總結的：「《清平山堂話本》和『三言』等幾部重要的話本集又是明朝人編刊的，其中雖不乏初作於宋元的舊篇，却已經過了明人修改而加進了明朝的語言成分。……『話本』語言層次上的這種複雜性給我們利用這部分資料增加了困難。」〔六〕他又具體指出，《清平山堂話本》「二十九篇中有三篇是明朝人的作品，其餘都是宋元人之作」〔七〕。以往我在校注宋元話本時，曾得到劉堅學長的許多幫助，現在我只能在他的遺著中找一些材料來支持我的考察了。在此對他深表懷念和感謝。

小說史的學者比較謹慎，對話本的斷代，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如對《清平山堂話本》作過全面校勘的石昌渝先生，就認定宋元作品只有十七篇〔八〕。而對《六十家小說》作了綜合研究的常金蓮女士，則認定宋元作品共有二十三篇〔九〕。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主要一點是除了可以肯定爲宋元作品的篇目之外，能不能都確定爲明代的作品呢？

《清平山堂話本》中有好幾篇口語化程度很低的簡本，語言的時代性極不明顯，而且

雜糅了元代前後的文字特徵。最明顯的例證是「元」字的改不改「原」，能不能以此作為斷代的標準呢？

元明之間，一個最明確的標誌是「元」字的使用。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一《國初諱用元字》說：「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一〇〕}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年號別稱》說：「又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又民間追恨蒙古，不欲書其國號，如南宋寫『金』字俱作『今』字。」^{〔一一〕}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二《元》條又說：「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或以爲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一二〕}

我們也曾利用這一個區別來判斷元以前作品的年代。《清平山堂話本》裏絕大多數地方都用「元來」一詞，但有五篇作品用了七次「原來」（參看中里見敬文中引佐藤晴彦的統計^{〔一三〕}）。我們能不能就此判斷這五篇是明代作品呢？顯然不能。因爲在同一篇裏也是「元」「原」並用，更大的可能是明代人改而未盡。再說，明代的書手也可能沿襲舊習而用了「元」字，不會到洪武元年開始就一律改用了「原」字，也可能在傳抄傳刻中對前代作品已經隨手改成了「原」字，所以「元」字可以作爲早期作品的例證，還不能

作為惟一的標誌。值得注意的是七次「原來」中六次見於《雨窗集》卷上，似乎有編印較晚的跡象。

我認為既不能肯定為元代以前，也不能肯定為明代以後的，不妨存疑為好。但是話本作為民間說唱文學的史料，具有傳承性和變異性的特徵，我還是盡可能地探索了一些文獻和故事情節的淵源，舉出了一些語言文字複雜性的例證，藉以說明它是「累增式」或「世代累積型」的小說。

我覺得語言學家根據漢語史的研究成果判斷作品的年代，是科學性較強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當然，還要結合歷史和文獻的研究。經過多年的考察，我認為《清平山堂話本》裏包括了宋、元、明三代的作品。其中大部分可以確認是宋元的作品，但曾經後人有意的修訂或無意的誤寫，出了一些矛盾的現象。有人看到個別的語詞和名物制度的特徵，就確定了作品年代的下限，但忽視了其他方面的反證，這是不全面的。根據多年來多位學者從各個不同方面研究，基本上認可了一個結論，就是早期話本是世代累積型的產物，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清平山堂話本》就是這樣的一本小說集。例如《簡帖和尚》一篇，前人大多認為是宋人作品，許政揚先生《話本徵時》從「如今叫做『聯手』，又叫做『巡軍』」兩句話，考證為元人所作〔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然而從整篇故事

看，話本裏却有很多宋代人所用的語詞和文字。例如話中用了不少助詞「底」字，這是常見於唐宋文獻的，在《朱子語類》和《五燈會元》裏可以找到許多例證，到元代就逐漸被「的」字取代了，到了《古今小說（喻世明言）》裏就都改成了「的」字。還有話中說到「你慫不敢領他」、「見他慫人去」的「慫」字，也是宋代人所用的字，元人多用「每」字，明人多用「們」字。又如主人公皇甫松，開頭說他「本身是左班殿直」，是宋代的武職官名。政和二年（一一二二）改名成忠郎，而以內侍高品改稱左班殿直。小說人說皇甫松是「左班殿直」，沿用的還是政和二年以前的官名，元代的說話人未必會按典章制度來評定他的職稱，應該是傳承祖本而來。再如說「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襖上邊回來」，這是武官左班殿直的一項任務。邊防軍的衣襖由東京押送去，這是北宋時的制度。北宋人所著《楊文公談苑》記載：「國朝之制，文武官諸軍校在京者，端午、十月旦、誕聖節，皆賜衣服。其在外者，賜中冬衣襖，遣使將之。」^{〔二五〕}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四記載宋仁宗的詔令說：「押賜外州軍衣襖，舊皆差伎術官，比來宗室、戚里多以親屬干請，至有諸司使、副及京朝官爲之，煩擾州縣，自今一切罷之。」^{〔二六〕}恐怕元代的說話人也未必能熟悉這些制度。話中還提到了許多東京的地名，可見是「京師老郎傳流」的節目。因此我認爲《簡帖和尚》基本上是宋代的作品（詳見本書的注釋），甚至它的上限還在

北宋時期，話文中「聯手」「巡軍」的解釋則是元代說話人的插話。

另如《戒指兒記》一篇，許政揚先生從商人子弟可以點報朝中駙馬的情節，考證為明代的作品，這是很敏銳的發現，的確可以論定了。小說基本上是明代人寫成的，但是也要注意這個故事的母題流傳已久，宋代就有西湖庵尼的故事^{〔七〕}，就是它的前身。篇中也有一些較早通用的語言成分，如「告」「度與」「靜辦」等，還是宋元時期通行的語詞，還有較早通用的文字如「那」（挪）、「卓」（桌）等字。它可能也有更早的基因。如陳太常的人名或許由宋代太常卿的官名訛傳而來，而明代還有同出一源的傳奇小說《寶環記》^{〔八〕}。從大體上說，《戒指兒記》寫定於明代是可以肯定的，但也不會是一人一時之作。

我們只能從時代特徵的多少，來探討作品大體上寫定於哪個時期。除了叙明代故事的《風月相思》之外，其餘二十八篇都可能元代之前的成分，只是多少不同。有些時代特徵極少的只能存疑待考。有的已徹底改寫的如《喻世明言》裏的《衆名妓風流弔柳七》則只能算是明人作品了。我把有關問題放在各篇第一條注文中加以說明，疑問較多的只能提出一些跡象供讀者參考。

《清平山堂話本》的情況比較複雜，不僅收入了宋、元、明三代的作品，而且也包羅了

文白並存、繁簡各異的版本。從題材來看，有漢代的司馬相如、李廣、馮唐、范式、張劭等人物，素材大多出自《史記》《漢書》，有些文字就抄自漢代的史書，時代的特徵很不明顯。有的摘錄自傳奇小說，如《藍橋記》基本上是裴鏞《傳奇·裴航》篇的摘要，應該說還是唐人的作品，只有一兩個字是後人改筆，加上首尾一首入話詩和兩句散場的留文，我們可以從中推測它大概是說話人用的提綱。《刎頸鴛鴦會》的頭回摘錄自皇甫枚《非烟傳》，也是唐人所作，我們就不能據以尋找宋元或明代的語言文字，也不必用《通言》的文字來作校勘。《風月相思》顯然是明代人寫的「詩文小說」，全篇文言文，與《剪燈新話》等書完全一致，但是開頭又加了四句入話詩，看來也可能是說話人準備的「掌記」，但全篇都是明代作品的風格。還有一篇僅存殘頁的《翡翠軒》，性質也和《風月相思》相同，寫的是元代故事。因為首尾都已缺失，更無法尋找時代特徵了。

《清平山堂話本》裏錯別字、異體字很多，其底本應是傳抄本或拙劣的坊間刻本。然而其原創者却不一定水準很低，有的作者大概是有一定文化修養的書會才人。只是刻印者却往往粗製濫造，弄得錯誤百出。不少話本引用了李煜、柳永、蘇軾、辛棄疾的詞，有些詩詞賦贊寫得還比較工整雅致。正如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闢》所說的：「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論才詞有歐蘇黃陳佳句，說古詩是李杜韓柳篇章。」比之清

代說書的話本《飛跢子傳》《清風閣》《龍圖耳錄》《小五義》等，却顯得文雅得多，保持了一點雅俗共賞的文風。這可能是宋元時期低層文人由書齋走向瓦市的結果。宋元之際的王六大夫、朱桂英、丘機山等就是他們的代表。在這一代的說話人和書會才人中出現了施耐庵、羅貫中這樣的大家是完全可能的。《清平山堂話本》的結集，也給我們提供了文人和藝人相結合的範例。明代文人又有了應試當官的出路，尤其是以代聖立言的八股制義作為敲門磚之後，文人很少再和說話藝人相結合了。明代說話藝術逐漸衰退，因此沒有出現優秀的話本，這也是小說史上值得研究的課題之一。我們以元代作為話本的一個時限，也是有原由的。

宋元話本的另一個問題是藝術水準的不平衡，是否體現了時代的先後。現存藝術水準較高的繁本如《簡帖和尚》《楊溫攔路虎傳》等如果是宋代作品，那麼晚出的作品是不是應該寫得更好呢？那些簡單粗糙的作品又是產生於什麼時代的呢？有人以《喻世明言》裏《陳巡檢梅嶺失妻記》《五戒禪師私紅蓮記》的修訂本為標準，認為後出轉精，藝術水準高的一定是較晚的作品。但事實未必如此，《清平山堂話本》裏有較精的繁本，也有較粗的簡本。它包容了不同水準的作品，我們不能簡單地從藝術成就的高低來判斷它的早晚。如成就較高的《簡帖和尚》倒是年代較早的作品。馮夢龍（或另有其

人）不知道入話那首詞是辛棄疾的作品，就把它改錯了；把「道士頭」改成「罪人頭」，就犯了一個知識性錯誤。在這一點上，《簡帖和尚》原作者的知識結構比馮夢龍還寬廣一些，不過在傳承中却出了不少錯訛，留下了校勘的難題。

如前所說，宋元說話人和書會中有不少「才人」，從引用的書史文傳和詩詞歌賦看，確有一些如《醉翁談錄》所說的「雖爲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書中的許多錯別字、異體字，大多是在記錄、傳抄、傳刻中造成的。從這一點，可以推測其中有說話人口耳相傳的語錄本。明刻本的《金瓶梅詞話》等書，也可以作爲旁證。此外，還有刻書坊肆意刪節的問題，如元刻本平話《三分事略》和《元刻雜劇三十種》那樣的版本，就都是節本。《清平山堂話本》裏收了不少提綱式的簡本，只是說話人的資料。如《藍橋記》那樣，根本不能體現宋元說話的藝術水準，但還可以用作小說史的一種史料，爲《醉翁談錄》的《小說開闢》增添一個篇目。

有人只把一部分提綱式的簡本看作宋元作品，從而論定「三言」裏的繁本都是明代人的修訂本甚至定爲明人所作。這也是不全面的。一則《清平山堂話本》裏已有一部分成就很高的繁本，可以定爲宋元作品。二則「三言」裏原注爲「宋人小說」或「古本」的，其語言文字的特徵還可以與《清平山堂話本》作互證。這正是《清平山堂話

本》的文獻價值所在，也是我們重視它的原因。

歷史現象，總是「說有易，說無難」。宋元時代常見的語言現象，不能說到了明代一下子就消失了。所以必須和其他書證聯繫起來作綜合的考察。某些口語成分很少的篇章，雖然我們也找出了一些早於明代的語言現象，但是並不敢確定它就是元以前的作品。這就是我以前在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時沒有把本書裏所有作品都收進去的原因。經過這幾年的繼續思考，對話本的斷代研究略有進展。有些問題不是寫篇論文所能說清楚的，所以乾脆對《清平山堂話本》全書做一次校注，提供同行學者討論。《清平山堂話本》裏錯字缺字很多，對於廣大讀者來說不是一個好版本，我只想提供一個基本保持原貌又比較可讀的版本，既大膽逕改了一些錯字，又做了詳細的校注，以免重蹈前人武斷臆改的覆轍。這樣的注釋不免過繁，讀者不妨先讀正文，有疑問時再查注文。

總起來說，大致有幾點可以談談：

一、《清平山堂話本》收集了許多宋元小說家的話本，有的可能經過明代人的修改，但改得不像「三言」那樣多，所以保存了較多的時代特徵。

二、《清平山堂話本》絕大部分是話本，但有些簡本只是素材和提綱，基本上還是資料。只能表明元代以前曾被用作說話題材，是一種小說史的有用史料。

三、《清平山堂話本》標誌着說唱文學的一個階段，其話本和講史家平話一樣，經歷了世代累積的過程。話本年代的上限和下限跨度很大，其下限直到嘉靖年間刻書之前，最晚的可能是《風月相思》，因為它講到了「倭夷有警」，因此命馮琛為靜海將軍，像是明代中期才有的事。說話這種技藝在明代並未中斷，只是往往改稱為說書了。直到明末的柳敬亭，似乎還能說短篇的「小說」〔二九〕。因此明代仍有小說家的話本，也是必須考慮的。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儘量在上下限之間尋找比較確定的時代特徵，包括歷史文獻和語言文字的例證。詳見本書的校點凡例。

近代漢語學家利用《清平山堂話本》作漢語史料，首先要確定它的年代，然後再從中選擇例證，歸納規律性的時代特徵。而考證作品的年代，語言成分又是非常重要的依據。這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因此必須把它和已知年代的文獻結合起來研究。我借助語言學家的一些結論，對《清平山堂話本》再逐篇比較、驗證，在運用晚出的「三言」作他校時，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因為「三言」裏的文本又經過了後人的修改。王力先生講漢語史時，一再告訴我們前人作詞語訓詁要求做到「例不十，法不立」。我在對某些詞語作注釋時力求多舉一些書證，但一般做不到，也不便都列舉到十個以上的例句。舉證先用本書的例證，其次才用後出（編印在後）的文獻。儘可能用已知年代的文獻作參

證。我對近代漢語並無研究，只能借助一部分語言學家的成果，引為佐證。當代漢語史學者對《清平山堂話本》的研究成果很多，限於我的精力和時間，無法廣泛檢讀，更不敢掠人之美，以為己功，只好抱殘守缺，留下了許多存疑待考的問題，但一般不出「未詳待考」之類的注文。

本書注釋參考時賢成果者很多，詳見引用書目，或有遺漏，在此統表衷心的感謝。書中有關佛經的典故，多承白化文學長指教。在定稿工作中承劉彥捷女士幫我覆校原書並用電腦技術彌補了我的不足，還承擔了本書的責任編輯，為我做了不少覆核工作，責任校對郭惠靈女士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並表謝忱。筆者讀書不多不細，本書的校注必有許多遺誤，期待讀者批評指正。

程毅中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注

〔一〕《中國小說史略》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二八七頁。

〔二〕《浦江清中國文學史講義（宋元部分）》，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一版，二二一—二二三頁。

〔三〕同上書，一九七頁。

〔四〕中里見敬《論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平山堂所刊小說——以版式與刻字爲視角》，《明清小說研究》，二〇〇七年四期。

〔五〕關於洪梗的生平，常金蓮《〈六十家小說〉研究》書中有較詳的考述，可參看。

〔六〕《略談「話本」的語言年代問題》，《劉堅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九月一版，九六頁。

〔七〕《古代白話文獻簡述》，同上書三六頁。

〔八〕《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二版，四一〇頁。

〔九〕《〈六十家小說〉研究》，齊魯書社二〇〇八年九月一版。

〔一〇〕《戒庵老人漫筆》卷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二月一版，一四頁。

〔一一〕《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年號別稱》，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一版，七九九頁。

〔一二〕顧亭林《日知錄》卷三十一《元》條。

〔一三〕同注〔四〕。

〔一四〕《許政揚文存》，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一版，二五六—二六六頁。

〔一五〕《類苑》卷二十五引。李裕民輯本《楊文公談苑》一〇八條《賜衣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一版，七二頁。

〔一六〕《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四，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版，二四二〇頁。